

桂林文史資料

第四輯



桂林文史资料

第四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桂林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封面设计 沈丰民 周之尧
封面题字 伍纯道
封面篆刻 李晋光

桂林文史资料

第四辑

*

政协桂林市委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字数：170,000

1983年12月第一版 198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2,000 定价：0.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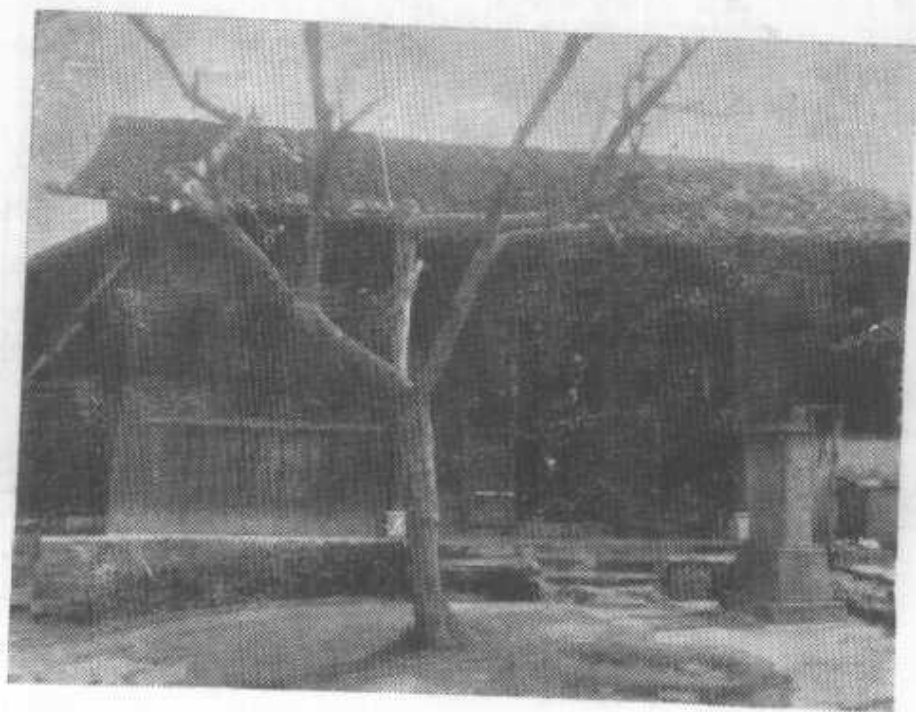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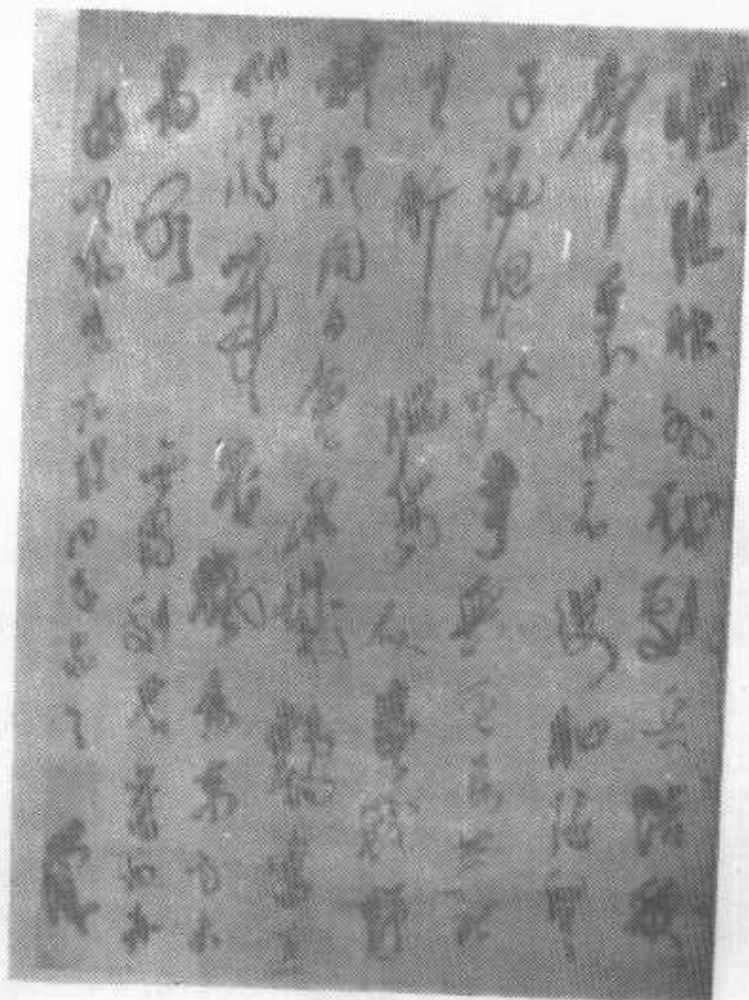
编 者 的 话

第三辑的“忆陈光烈士”和本辑的“忆李克农同志”、“黎明前的战斗”等三组革命史料，是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在桂林这块土地上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记录，老年人读了可以从中得到启发，不致忘记过去；对年轻人，更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教材。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五日至五月十九日在桂林举行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是桂林文化城在四十年代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一次在国统区抗日进步演剧的空前大检阅”（茅盾语）。明年（一九八四）是西南剧展的四十周年，为了纪念西南剧展，帮助读者了解西南剧展的历史背景、意义和剧展的全部活动，特地提前刊载瞿白音、田念萱合写的长篇回忆——《回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西南剧展是在当时的广西省立艺术馆举行的，关于艺术馆的情况，本辑选载了四篇文章，都是当年在桂林和艺术馆工作的同志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

桂林在抗日战争时期被誉为“文化城”。“文化城纪事”这一专栏主要是记录当年在桂林从事文化活动和的人和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桂林文化城的历史。本辑选载四篇，文笔活泼轻松，读来不会使人乏味。今后，《桂林文史资料》将继续刊载这方面的文章，希望当年在桂林工作过的老同志多给我们写稿。

田汉同志为西南剧展写的一首诗



桂林城工委旧址

目 录

回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 …… 瞿白音 田念莹 (1)

忆李克农同志

克农同志二三事 …… 夏 衍 (37)

桂林工作时期的克农同志 …… 龙 潜 (45)

回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和李克农同志 …… 曾 昂 (53)

忆李克农同志 …… 黄 熙 (66)

回忆在桂林的地下斗争 …… 高天梅 (69)

黎明前的战斗

黎明前的战斗

——回忆桂林地下党英勇斗争片断 …… 郭其中 (73)

桂林城里干部论时局 …… 梁 山 (78)

为革命而学习

——桂林地下党干部训练班生活回忆 …… 郭其中 (82)

地下油印员的笑声 …… 郭其中 (85)

十四年前的今天

——桂林地下党散发传单的记忆 …… 郭其中 (88)

难忘的时刻 …… 尹 伊 (90)

民在
主桂
同盟林

桂林民盟在中共广西地下党领导下

战斗前进 …… 潘国贵 (92)

回忆解放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

战斗生活 …… 植恒钦 (98)

我入盟前后的一段回忆 …… 魏华龄 (108)

桂林风雨与文人	曾敏之 (114)
榕斋读诗记	柳亚子 (121)
惜别李济深将军	庆 燕 (127)
不平凡的宴会	
——记桂林文协欢宴李济深将军	敏 之 (131)

省立艺术馆的工作概况	欧阳予倩 (135)
广西省立艺术馆	李文钊 (140)
六年来的广西省立艺术馆	党 明 (147)
广西省立艺术馆三十五年度各部 工作报告	殷之濂 (163)

三年来广西中山纪念学校	杨寅初 (176)
桂林中山纪念学校始末	周 邦 (194)
广西中山纪念学校办理要则(草案)	杨寅初 (198)

桂林市织布工业调查报告	统计室 (207)
桂林的纺织手工业	安 正 (224)
桂林的土布业	邓时和 (229)

月牙山的素豆腐	郑 宾 (232)
又益轩马肉米粉	洪顺美 (243)

绝命诗(四首)	蒋翊武 (245)
对《桂林文史资料》第一辑 的一些订正	苏蔚三 张 猛 (246)
《对〈桂林文史资料〉第一辑的 一些订正》的我见	裴邦佐 (248)
《桂林文史资料》第一辑勘误	· (250)

回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

瞿白音 田念萱

壮绝神州戏剧兵

耻随竖子论肥瘦

肝脑几人涂战野

鸡啼直似鹃啼苦

浩歌声里请长缨

争与吾民共死生

旌旗同日会名城

只为东方未易明

田 汉 1944年春西南剧展献句

一九四四年，在中国戏剧运动史上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我国西南数省的戏剧团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广西省战时省会所在地、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中心之一的桂林，举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展览会的内容包括了话剧、京剧、桂剧、傀儡戏、少数民族歌舞、杂技等的会演，戏剧资料展览和戏剧工作者会议。参加大会的戏剧工作者近九百人，会期自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五日起，历时九十日。

那一年，是我国人民对日抗战的第七个年头，也是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三个年头。意大利法西斯无条件投降了。英勇的苏联红军已经把希特勒匪军全部逐出了乌克兰平原，

正以迅雷疾风的威势向西猛进，德国法西斯也是摇摇欲坠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线上节节失利，也已是走投无路之势。国际形势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苏联为主的反法西斯的力量正在向最后胜利的前途迈进，形势是令人鼓舞的。

可是，我国对日抗战的形势，那时候却还是处于相当艰苦的阶段。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以来采取了可耻的“观战”政策，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依然担负着抗击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在华敌军的严重战斗任务。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依然侵占着我们的广大国土，而且还策划着新的进攻，企图打通平汉（京汉）、粤汉两条铁路，以支撑它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危局，和对国民党进一步的诱降和逼降。我国的广大人民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七年以来，对于大敌当前的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广大人民在敌人铁蹄之下的痛苦呻吟，国民党政府是视若无睹的。他们最关心的不是抗击民族敌人，而是倾全力来反对坚持团结抗战，坚持进步的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力量。国民党政府长期以来处心积虑地策划的是“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在这种可耻的政策之下，对他们统治的地区内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进步文化事业也极尽了摧残迫害之能事。封闭进步的报馆、书店，禁止进步书刊的出版发行，捕杀进步的文化工作者，这一类的坏事真是罄竹难书。进步的戏剧运动的遭遇，当然不可能例外，它所受的迫害，甚至更大更多。

谁都能清楚地记忆，从抗日战争开始时起，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战的号召之下，全国各地广大的戏剧工作者英勇地投身抗战，他们走向前方，走向工厂，走向农村，为民族

解放事业奔走呼号，贡献出全心全力，有的甚至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到了一九四四年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前方和后方的戏剧工作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正如夏衍同志发表在同年二月十五日重庆《新华日报》上的《我们要在困难中前进》一文所说的：

……抗战以来，曾经盛极一时的部队戏剧工作，渐渐地衰退了。政治部的十个抗敌演剧队，只有半数还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继续工作，一部分变了质，一部分解散了。武汉会战前后，很多部队和战区政治部都自己组织了演剧队，一时也有了相当的成绩，但几年来这些戏剧队伍也渐渐地变成无声无息，而终于停止活动了。……在前线上支撑了几年的戏剧干部，感到苦闷、彷徨，而终于动摇了。贫、病，看不到书报，找不到剧本，干腻的那一套已经满足不了士兵和老百姓的要求，支付了年青的生命换取的工作也得不到人们的注意与支撑，他们变成逐渐削弱的孤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我们仿佛是被遗弃了的孤儿”。……

情形正是这样。以当时西南地区前线的一些演剧队来说，首先是被剥夺了深入部队与士兵接近的权利，他们长期得不到为士兵演出的机会。至于政治上的监视与迫害，那更是花样百出，有的地方强迫演剧队的成员加入国民党，有的地方派遣特务混入团队阴谋破坏，有的地方把忠贞纯洁的青年队员抓去强迫做坏事，因而逼得自杀。工作上的正当要

求既得不到满足，政治上的迫害则有加无已，生活上又处于贫穷交加的状态，在三者夹攻的情形下，苦闷和动摇是不难理解的。他们有的向往着去到光芒万丈的革命圣地延安，去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有的希望到国统区后方去从事较多的艺术实践与技术锻炼。但是，当时戏剧工作在国统区后方的遭遇又是怎样的呢？这又正如上面所引的夏衍同志的文章中所说的：

再让我们的眼睛转向后方。“话剧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已经是一句惯用的口头禅了，但是……就很少有人设身处地的体会一下后方戏剧工作者的艰难。戏剧被当着后方“繁荣”的点缀，被当作少数有钱人的娱乐，被当作募集捐款的手段，被当作增加税收的来源。要求于剧本的是一套义正词严的道理，一百个“不可”，一千个“不得”，戏剧非有“教育意义”不可，不得“与抗战无关”，而另一面将营业税、娱乐捐、节约建国储蓄券，各种救济捐款等等，一层一层地堆压上去的时候，戏剧又分明是纯营业性的、纯娱乐性的、捐税的对象。

……

我们也全清楚地记得，在那样的时候，要支撑一个进步的、职业性的民间剧团，那真是万种艰辛、千百般困难。政治上的迫害是首要的，剧本要经过重重审查，多方留难，即使通过了，甲机关准许上演，乙机关又伸出魔掌来禁止。其次是经济上的极端困难，既要担负着反动政府的杂税苛捐，又要遭受戏院商人的重重剥削。西南地区（重庆在外）的进步的

戏剧工作者虽曾作了无数次的努力，以血汗和饥饿作代价，艰苦支撑经常性演出的剧团，但除了个别幸存以外，大都是无法持久。国民党统治者是决不给进步的戏剧运动任何发展条件，相反的，是为进步戏剧运动的衰落与垮台准备了一切条件的。

在这样的时候，在反动统治的高压下，在进步的戏剧运动遭受窒息而日趋凋蔽的情形下，西南数省的戏剧工作者是如何渴望有一次集会。希望通过这样的集会，重新肯定戏剧为抗战服务的方针，使自己的行将疲惫的脚步重新振作起来，怠倦了的身心在集体力量的鼓舞下重新昂扬起来。希望通过这样的集会，相互交流经验，观摩成绩，从而端正艺术创作上和工作作风上的某些倾向。希望通过这样的集会，使原来分散各地，不易会面的团队集合在一起，互相检阅力量，提高信心，加强团结。西南剧展就是在人们的这种要求之下在桂林举行的。

这样一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集会，为什么恰恰在桂林来举行呢？

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广西一直是桂系军阀割据的地方，文化经济都比较落后。抗日战争初期，苏、浙、皖、赣、湘、鄂等地区的文化工作者纷纷来到桂林，进步的文化工作有了相当蓬勃的气象，桂林便因而赢得了文化城的称号。桂系地方势力与蒋政权中央，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存在着矛盾，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种矛盾在表面上似乎有了缓和，但实际上是依然存在的。地方势力为了保存自己的统治地位，必须利用各种可资凭借的力量，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由于这样，所以广西地方当局对待进步力量（包括进步的文化工

作)的态度,是亦打亦拉。在皖南事变中,桂系曾公开反共,但当这一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又逐渐回复了亦打亦拉的状态。在他们本省文化工作方面,也曾有过一些带若干积极意义的设施,如成立广西戏剧改进协会,创办广西省立艺术馆等。总之,在不直接损害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装出比较“开明”的姿态的。进步文化界掌握了这种情况,便利用了桂林这一城市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据点。就戏剧方面来讲,自从一九三九年秋天,由党所领导的《救亡日报》主持,集合了当时桂林的广大戏剧工作者,举行了夏衍同志的剧作《一年间》的盛大公演以后(那次公演是以国语、粤语、桂语三组演出),进步戏剧工作者就始终坚守着这一阵地。到广西省立艺术馆和新中国剧社相继成立,在桂林,戏剧方面的力量是相当雄厚的。

广西省立艺术馆成立于一九四〇年三月,馆址在桂林榕荫路后面一条陋巷里的一所破旧民房,经常演出时,需要以高价租用戏院,对于工作的开展,是非常不便的。因此,艺术馆本身有建筑馆址的迫切要求。伪广西省政府对于艺术馆所提出的要求虽然同意,但只发了一块地而不给建筑费。于是,艺术馆只好采取了募捐建馆的办法。在欧阳予倩馆长苦心筹划之下,一方面广发捐册,向社会募集建筑资金,一方面设计兴工,进行建筑。工程是在一九四二年开始的,由于经费的短绌,战时物力的艰难,曾经一再受阻,进行得很不顺利,直到一九四三年冬,工程才算是大体上完成了,预期一九四四年二月全部落成的希望,可以实现。这个包括有剧场在内的艺术馆新址的行将落成,桂林的戏剧工作者们是以万分喜悦的心情来迎接它的诞生的,大家都设想在这新厦落

成之际，在戏剧活动上应当有一番令人鼓舞的蓬勃气象。

桂林戏剧界的另一支基本队伍——新中国剧社，是在一九四一年十月成立的，它是一个由田汉同志大力支持和领导，由一群青年戏剧工作者自己组织的民间职业剧团。它的主要成员都曾经参加过抗敌、救亡演剧队，这些青年同志都富有救亡青年所特有的革命热情，他们为支撑和维护这个剧社所表现出来的坚持不懈的苦干精神，是令人非常感动的。这个剧社成立以后，克服了数不尽的困难，在桂林坚持了为时一年的经常演出，把剧社的基础初步的稳定下来。一九四二年底，剧社出发赴衡阳、湘潭、长沙等地作旅行公演。通过在衡阳各地的公演，扩大了社会影响，也解决了剧社经济上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秋天，剧社同志怀着更坚强的信心回到了桂林。由于他们的归来，使得前此较为沉寂的桂林剧坛又趋于活跃。

艺术馆新厦的行将落成，新中国剧社的旅行演出归来，这是能够在桂林搞一次大规模的戏剧活动的直接因素，但它不是主要的因素。主要的因素还是由于桂林的戏剧工作者们有一个孕育已久的共同愿望：“为了迎接更艰辛的战斗，更繁重的任务”，迫切地向往着一个再团结、再动员、共同检阅的机会，而这一愿望又是符合于其他各地的广大戏剧工作者的要求的。

主观上有此要求，又具备着可以发挥的力量，客观上也有可资运用的条件，所以，桂林的戏剧工作者们，几经酝酿之后，就毅然提出了一个倡议，倡议在桂林举行一次戏剧展览会。这一倡议很快得到了西南各地戏剧团队的热烈响应。于是，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在欧阳予倩、田汉两

位前辈的主持之下，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开始了筹备工作。

二

在筹备工作的最初阶段，考虑到动员全国范围的戏剧团队参加大会，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经过研究之后，就暂以粤、湘、桂、黔、滇五省及其相邻的闽、赣、鄂三省的戏剧团队为基本参加单位，对于国民党统治区其他省份的戏剧团队则邀请观摩，因此定名为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同时，考虑到必须使这一集会成为完全公开的、合法的组织，就决定推由官办的广西省立艺术馆发起，由欧阳予倩同志以艺术馆馆长的名义向各省的戏剧团队发出了如下的通知：

敬爱的同志：抗战以来，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承继着数十年来优良的革命传统，热烈地响应了神圣的号召，用我们的武器——戏剧艺术，积极而毫无保留地参加了全民族的英勇战争。在前线，在敌后，在省边，在后方，忍受了一切艰难困苦，不顾一切危险，对抗建大业，贡献了所有的力量。这一剧运的巨潮，在艺术运动历史上，写成光辉的一页，是毫无愧色的。

戏剧工作者不仅对抗战贡献了一切，自身也从抗战中获得了飞跃的进步。抗战也使我们的工作和运动奠定了更坚实而稳固的基石。同志们，我们试看，这七年来，我们的阵营里，增添了多少巨大而新生的力量，我们的营地，扩宽了多么辽阔和遥远

的地方！有战斗的地方，就有戏剧，有戏剧的地方，就有战斗。我们的技术，在质和量上，都无可否认地得到了急速而显著的提高，我们自身获得了空前广大而坚定的团结。七年，这短短的七年，可是我们所付出的和所收获的，却抵得上平时的十倍。同志们，我们应该欢欣，我们应该安慰。

可是，我们应该自谦、自省。如其把我们的战斗任务深切地忆起的话，我们应该说，我们的成就，和客观的要求相比，还有着不近的距离。尤其是战斗进入严重的阶段，胜利将要接近的目前，战斗一定会更艰苦，更残酷，而我们更必须磨砺我们的刀枪，增长我们的力量，来催生这胜利的婴儿。

我们应该承认，在这些战斗的日子里，我们彼此间还没有充分的联系，缺乏互相观摩和借镜的机会，缺乏分享彼此得失忧乐的愉快。这在我们的工作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损失。为了迎接更艰辛的战斗，更繁重的任务，我们必须弥补这些损失。桂林的戏剧工作者有鉴于此，拟就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址落成之机会，于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戏剧节，在桂林举行戏剧展览会及戏剧工作者大会，推本馆主办。诚恳地向敬爱的同志们邀请，请同志们热烈参加。……希望由于这一个集合，我们得以聚首一堂，来表示集中的力量，并讨论我们的得失。把我们七年来的辛苦、短长、艰难、快乐，面对面，心印心的倾诉，使我们更坚实，更壮大，以迎接更艰难的任务。

这里附上展览会暂行章则一份，请同志们指正，并提供宝贵的意见，使它更完美。而最企盼的是你们能以七年来丰饶而辉煌的成绩，参加这一盛会。

在发出通知的同时，通过与西南各地几个主要团队的联系商讨，成立了正式的筹备委员会，推欧阳予倩、田汉、丁西林、魏曼青、舒模、吴荻舟、徐洗尘、吕复、赵明、瞿白音、汪巩、冯玉昆、刘斐章等三十余人担任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并互推欧阳予倩为主任委员。

筹委会的工作，是相当复杂而繁重的。这样大规模的戏剧活动的集会，以前既未有过，自然没有成套的经验可以参考或依循，大家只好摸索前进。筹委会的任务是要尽一切力量保证大会能顺利进行，首要的是必须政治上采取正确的措施，使这一集会不受或少受压力和阻力。尽管桂林有着某些政治条件，但就整个国统区的情况来讲，毕竟是非常不利的。参加地区虽然没有遍及全国，但要动员八个省区的团队，仍然是一个极不简单的问题。对于可能遭遇的、来自反动统治阵营的各方面的阻挠、打击、破坏和迫害，不能不作充分的估计，而预先采取相应的措施。于是，经过周详的研究，决定把伪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抬出来担任大会会长，并用黄的名义向有关部门的上层人物发出请柬，邀他们担任大会的名誉会长。除了伪九战区的薛岳及湖北省主席某人外，其他被邀的人，都复信表示愿意“共襄盛举”。这一措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大大减少了来自上层的压力。上层既通，中层也必须打点，便也用黄的名义聘请了有关省的伪教育厅长和国民党广西省、桂林市党部的书记长担任所谓指导